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前言

2005年3月中共公佈《反分裂法》後，其總體對台政策基調不變但手法運用上更為細膩、軟化(例如胡四點)，¹ 而隨後國內在野黨一連串的訪中行動又掀起了新一波的「交流熱」、「中國熱」，同時搭配此一交流活動的還伴有相配套的優惠政策，以及各種形式的交流。當大家多將焦點注目於經貿交流的同時，即使在公報中有許多政策，² 明顯是為青年交流所量身訂做，³ 但就相關研究而言，青年交流此一領域仍較為人所忽略。

青年為構建未來兩岸關係的重要參與者，同時也是未來兩岸趨勢走向的影響者與領導者。⁴ 因此，研究中共對台政策中的青年交流部分不但具有描述當前交流情況的特點，同時還能具有預估將來走勢的能力。中共對台政策在胡錦濤執政之下有相當大的轉變與發展，⁵ 本文即是研究在這樣新形勢之下的兩岸青年交流，其中的成員在經過了往來互動的交流過程後，是否會在政治態度上發生轉變？若是的確發生了轉變，在未來兩岸關係上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基於上述問

¹ 胡四點的內容為：一、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四、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復興。

² 相關的優惠政策可以參見「連胡會新聞公報」，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Symposium/s94/940615-3-NS.htm>>；「胡錦濤與宋楚瑜會談公報」，新浪網，2005年5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05-05-12/19085871946s.shtml>>。

³ 宋胡公報中提到，大陸方面儘快實施在大陸就讀的臺灣學生與大陸學生同等收費標準，並爭取於年內設立臺灣學生獎學金。並且，將積極推動「兩岸民間菁英論壇」，彙集兩岸專家學者及各界傑出青年之智慧與經驗，集思廣益，研討兩岸關係發展的各項政策性建議。

⁴ 前陸委會吳釗燮主委在「2006年兩岸關係與大陸問題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開幕式專題演講表示兩岸關係沒有前例可循，很多地方是依靠兩岸的政府和人民在互動過程中逐漸累積經驗、建立默契，更重要的是在學界的協助下，我們努力建構出兩岸相互定位、互動基本秩序與架構，這是推展和建立兩岸長期穩定互動架構所必須的要件。青年學生都是未來創造兩岸對等互惠關係的重要參與者，尤其歡迎各位同學們的加入。另外，在2006年12月15日大陸方面中台辦主任孫亞夫於兩岸青年論壇中致詞時亦說：兩岸關係的前途和兩岸青年的命運息息相關，兩岸關係的未來寄託在兩岸青年身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兩岸青年決定著兩岸關係的前景。

⁵ 從朱雲漢(2005)的研究可以發現，目前中國當局公權力觸角伸入台灣經濟與社會的廣度與深度已是空前：目前有超過五百萬台灣居民申請過台胞證，至少七十萬人選擇長期居留，有十萬家以上台商與千億美金計的資產落腳大陸，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市與上櫃公司在積極西進，同時還有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準備將他們的營運重心放在大陸市場。這種發展趨勢的確讓我們不得不心懷戒慎。

題，筆者將以中共對台灣青年所舉辦的交流訪問團、青年論壇等(由於名目繁多，以下將以「青年交流」概括之)為觀察對象，透過指標與概念的劃分，檢定交流與態度間的轉換並論證青年交流接觸之重要性。

兩岸間特有的政治對立卻又經貿依存、交流緊密特殊關係，使得個人的態度或者認同成為受到關注的問題，且此問題更因為兩岸人員流動在「規模」與「數量」上有益形擴增的趨勢而更形尖銳。本研究即緣起於這樣的背景之下，在兩岸經濟社會文化整合的過程中，凸顯青年交流的重要角色，探尋在個人早期的交流接觸後是否會在政治態度或是政治認同層面上發生影響或轉變。本文主要想要探究以下幾個問題：兩岸青年交流的性質為何？交流接觸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又是如何？若是接觸交流後其在政治態度、政治認同發生變化，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接觸—變化」兩者間的轉換？最後，是否仍有其他重要變項存在兩者之間？

由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為青年交流是否會影響其中成員在政治態度發生轉變。此一主題所欲凸顯的是中共青年交流政策背後的政治目的。因此，本研究將焦點鎖定在：由中共中央官方及相關單位或是假由中共統戰、台辦及台研部門、涉台智庫、學校、民主黨派、中介團體等單位以統戰為目的，利用定期(寒、暑假)或不定期有計畫地與台灣青年學生進行聯繫與交流之活動，且此些活動是由政府部門釋放若干優惠措施，對我青年學生進行拉攏為研究主體。由於此些活動的名目繁多且遍及各領域，⁶ 故下文皆以「青年交流」統稱之。

本論文接下來的分析，將分為五章進行。筆者在緊接本段的第二章中，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中之自變項，即聚焦於青年交流活動中最為關鍵的三項統戰方式，分別為政治統戰、社文默化以及人際間的管道建構三者，分析其是如何組織動員以及如何運作；第三章則分項說明上述三種模式對於依變項--「個人態度(包括政治態度與政治認同兩層面)」造成何種影響，同時運用筆者深度訪談所得資料分別就個人之政治態度轉變層次或者無轉變之情況做描述與分析。第四章中筆者將再輔以統計量化的資料印證質性訪談之結果。運用一份針對台灣青年所設計的兩岸關係問卷，對於青年學子就兩岸相關議題之態度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

⁶ 趙成儀(2005)在「現階段中共加強兩岸青年交流之分析」一文中，將現階段中共推動青年交流作法大致分為四種形式：北京大會師模式、中華文化研習營模式、兩岸學校簽訂協議辦理學生交流模式、每年固定舉辦之長續性活動。

時觀察其在特定議題上之看法及其在經過與對岸接觸交流後之態度有無轉變。第五章的結論，則將總括本文論點，並試圖以此個案研究為基礎，嘗試推導中共大力推動下之「青年交流團」如何影響台灣青年學生之「政治態度/認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之研究主題為：台灣青年參與「青年交流團」是否會對其政治態度/政治認同上發生影響。青年朋友參與交流與中國大陸產生近距離的接觸，透過親身走訪瞭解與互動，能否對個人原有的觀念、政治態度以及政治認同造成轉變？兩岸間的密切交流所發展出的兩岸關係有著舉世少有的獨特性，即「政治面分離對峙、社經面卻緊密連結」，此一現象引起許多學者的高度興趣。就目前而言，如「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 及「互賴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 學者，對於國際政治中「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 議題是否將受「低度政治」(low politics) 議題影響，其爭論仍方興未艾。⁷ 兩岸關係由於歷史、政治等複雜因素已分治超過半個世紀，因此，生活於此區域之人民對於兩岸關係的政治態度也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⁸ 惟針對年輕人之政治態度/認同研究仍十分缺乏。

依中共統計，截至 2006 年初，全國台聯聯絡部已經舉辦 21 屆之、海外臺胞青年夏令營、11 屆臺胞青年冬令營；在二十年間舉辦 21 屆臺灣青少年夏令營、接待營員約 6550 人，舉辦 11 屆冬令營、接待營員約 1100 人，零散接待臺灣青

⁷ 見 Dorette Corbey, "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 Stagnation as a Boos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2 (Spr. 1995), pp. 253-284; Mehmer Ugur,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to the Dynamics and Policy-Mak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3 (1997), pp. 469-500; Robert O. Keohane & Stanley Hoffmann, "Communit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illiam Wallace ed.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0), pp. 276-300; Werner J. Fel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Issues* (Wesport, CT: Praeger, 1998)。

⁸ 統獨議題的出現到演進可見王甫昌「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期（1994），頁 1-34；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與一九八九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期（1996），頁 129-209；吳乃德，「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期（1992），頁 33-61；劉義周，「統獨態度的世代差異」，兩岸關係問題民意調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7 年 5 月 17-18 日。

少年的專項活動約 500 人，共計接待 8000 餘人，⁹ 同時，參與人數、活動規模及品質仍不斷在精進當中，由此觀之，研究國內青年之政治態度轉變與否確有其重要性。

態度是否改變極有可能是來自於雙方的互動與接觸所導致，不過，個人原先已有的統獨意識亦為決定態度是否轉變的關鍵。以下茲分為「交流接觸說」與「原有認同侷限說」加以討論。

一、交流接觸說

人際接觸被社會學家視為降低偏見、歧視的重要因素，認為透過親身經驗可以使個體獲得新的發現，進而可能造成態度的轉變，例如透過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提升雙方彼此的信任程度，使得原先對「異族」的反感，可能轉變為「同族」的好感。¹⁰

Gordon W. Allport 提出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意指不同族群的緊密接觸，會助長彼此的正面態度。刻板印象會導致族群之間的偏見或衝突，如果偏見是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頻繁接觸可以提供彼此資訊及知識，以減少偏見。延續 Allport 之接觸假設論點，Rupert Brown 亦主張，降低族群之間張力與敵意的最好途徑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讓他們彼此發生系統性接觸。¹¹

伊慶春及章英華亦指出，社會接觸乃根本的社會結構元素，政治態度固然能敏銳反應當下的社會情勢，進而可能影響個人的族群態度，但接觸假設所揭櫫的異族接觸之正面效應，應仍有其長久持續性的影響，並曾因為接觸內容之差異而導致不同的後果。¹²

⁹ 「牽手未來牽手希望」，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http://www.sclf.org/lasd/tbgz/lxlt/mtjj/200608/t20060815_843.html>。

¹⁰ Emory S. 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and Its Origi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ol. 9 (1925), pp. 216-226.

¹¹ 「接觸假設」之相關研究請參見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1954); Rupert Brown, *Prejudice: Its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5), p.236.

¹² 伊慶春、章英華，「對娶外籍新娘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學*，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91-232。

在討論認同形成與認同變遷的理論中，一般分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稱「根基論」、「本質論」essentialism)、「境況論」(circumstantialism，或稱「情境論」、「工具論」instrument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或稱「想像論」)三種主要的觀點，這三種理論引借了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研究途徑的部分觀點。其中，「建構論」雖然強調個人認同乃是由社會所建構，也未排除個人認同變遷的可能性；「境況論」則強調族群接觸是身份認同轉變的機制。由於「效益」(utility)是境況論者的中心思想，所以許多學者也將之稱為「工具論」，境況論顯然肯定認同變遷的可能性。¹³ 認同變遷不但是「認同取向」的變遷，即台灣人從原本未有中國認同轉而產生中國認同；也包括「認同程度」的變遷，亦即台灣人接觸大陸後增強或消滅原本對中國的認同，或增強或消滅原本對台灣的認同。

李美枝在探討台灣民眾對族群認同的隱性認知時，運用剪輯過後的特意保留非負面訊息的中國訊息影片，觀察受試者記憶深處的隱性認知，結果發現當記憶深處的「華夏原鄉情懷」被觸發後，對大中國的認同會有顯著的增加。而在今日兩岸互動更趨頻繁之時，台灣民眾有更多的機會得以近身觀察中國大陸的各個面向，不論是好的一面或是壞的一面，都可以親身接觸體驗。根據社會認同理論，類別化線索是提取族群對立關係的觸發因素，台灣民眾身赴大陸直接面對中國的人民、社會群體實況，有可能會更融入同文同種的大中國群體，亦有可能強化「臺灣」與「中國」的區隔。¹⁴ 個人所處客觀環境之接觸機會，將會形塑其認同且影響認同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台灣人接觸大陸人的管道愈廣、程度愈深，可以增加新的資訊，減少對大陸人之偏見與刻板印象，亦降低自身之相對優越感，對大陸人之觀感從「異族」變成「同族」，「反感」漸少，「好感」日增，可能從原本未有中國認同轉而產生中國認同，或者增強原本對中國的認同，形成一種稱之為「兩岸人」之「雙重身份認同」：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是我的家)。

¹³ 陳朝政，「台商在兩岸的流動與認同：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1995年)頁37-39。

¹⁴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本土心裡學研究*，20期(2003年12月)，頁66。

二、原有認同侷限說

在探討政治態度與政治認同是否發生轉變時，必須顧及個體原有之政治態度與政治認同，即在交流前個體歷經過至少十年以上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不論是顯性的政治社會化(manifes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即政治社會化的過程為人所意識的，像學校中的公民教育、政黨的宣傳、政治知識的學習；或是隱性的政治社會化(laten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包括家庭生活、省籍、父母政黨認同與同儕團體之觀念與政治態度，皆為青年個體奠定看待事物的基本態度基礎。

(一)政治社會化與個人態度

社會心理學的概念—「基模(schema)」提供了一種人們對事件看法或人們推論時之基礎。基模是一認知結構，它再現了一個人對於既定概念或刺激的知識，包括了概念的屬性及其屬性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基模可以關乎任何資訊架構，被視為關於任何特殊概念相關想法的推論系統—無論概念是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事件或某個抽象概念。理論上，基模在幾個面向上影響了意見形成。首先，他們形成了知覺的過濾器，相關公眾議題的資訊將透過此過濾器形成；其次，基模會形成推論的基礎，而這個推論是植基於回應公眾事務的資訊。

換言之，一個運作中的基模(an activated schema)將帶給心理一套相互關聯的概念，因此改變了人們在思考新資訊時的框架。易言之，基模提供了一種在思考與感知的心理速記法。它指引了對環境中某些特質的注意，形成了對事件或人們推論的基礎，也幫助一個人分類在記憶裡的資訊。¹⁵ 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影響個人在面對統獨議題時之態度基模，即可能為個人過去政治社會化歷程下對統獨之認知，或者是關鍵歷史事件對其造成之心理衝擊後產生之印象。

¹⁵ 劉嘉薇於 2005 年 9 月 19 日由杜克大學亞洲安全研究中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之「臺灣民意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軍購或反軍購？台灣民.態度之探討」一文(頁 4)中，以「基模(schema)」作為觀察民意的心理學基礎進行討論，為本文前置認同影響交流效果提供相當之啟發。

個人成長背景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以及國家的政治教育對於其統獨觀念的形成與持續變遷有重要關連。政治社會化的定義在陳陸輝、周應龍研究中歸納為兩個主要的界說，一是強調「個人獨特的成長」(the idiosyncratic personal growth)。如 Greenstein 所言，「(關於政治社會化)的一個廣義瞭解，它涵蓋人生各階段中的一切政治學習，不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計畫的或非計畫的，都概括在其中。換言之，此種政治學習，不僅包括明顯的政治學習，而且非政治的政治學習，例如像有關政治的社會態度之學習及有關政治的人格態度之獲取，只要具有影響政治行為的作用，也都包括在內」；第二種定義則是從社會體系的角度來看，把政治社會化定義為「社會將它的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¹⁶ 政治社會化對於塑造其公民的政治定向或內化政治價值於個人之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就個人政治學習效果而言，可以區分為「終身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終身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以及「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等四種不同模型。¹⁷ 「終身持續模型」是指政治社會化的效果相當持久，民眾一旦在統獨態度上採取了立場，應該就會持久不變；「終身開放模型」是認為一個人的政治定向是一輩子都「可能改變」，並不會是非常穩固的個人信念或個人價值；「生命週期模型」是人民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不同階段對其政治態度有不同的影響；「世代模型」則是指出生在同一時期的民眾受到相同的歷史、政治與社會環境所影響。¹⁸

另外一個重要的效果是所謂的「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它是指與特定時間點相關的影響。¹⁹ 重要的歷史經驗，較容易在個體青春晚期以及成年早期產生影響。²⁰ 本研究焦點是青年學子，年齡層上鎖定於 1970 年後出生之民眾。

¹⁶ Kenneth P.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¹⁷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th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47.

¹⁸ 陳陸輝、周應龍，「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149-151。

¹⁹ Norval D Glenn, *Cohort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7).

²⁰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Paul Kecskemeti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之所以將 1970 做為分界點，原因是在其後出生的人經歷開放言論自由與民主轉型時期，也經歷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及台聯黨的興衰。更重要的是，其剛成年之時歷經的兩岸台海危機對其所造成的「時期效果」，可能形成其在後來面對統獨議題時的原始認知基模。

(二)個人「兩岸相關政治議題認知基模」之重要組成因素

兩岸關係基本上可說是一個「政冷經熱」、「官冷民熱」的特殊格局。²¹ 而兩岸關係之所以特殊，不僅是因為兩岸是同文同種的分裂國家，更在於兩岸雖然在政治上處於高度對立，但在經濟上卻密切交流且台灣對大陸具高依存度；²² 在雙方人民往來上，依據我國各項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兩岸貿易、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台灣赴大陸的人次、兩岸文教交流人次、兩岸社會交流人數與人次等等，亦均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²³ 這種現象可說是「獨一無二」，在其它分裂國家未曾有之，故引發了學術社群的關注並針對此進行廣泛的討論。在諸多兩岸政治議題相關討論中，最具重要性的就屬「統獨態度」以及「自我身份認定」議題。本文以這兩議題為主軸再加上相關衍生態度與觀念，整理出三項形塑個人「兩岸相關政治議題認知基模」之重要因素：**族群認同、隱性意識內涵與共土共生之「生活場域親親性」**，茲分析如下：

1、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的紛爭一直是干擾社會穩定與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也一直是社會學、政治學及人類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²⁴ 自 1949 年蔣介石委員長帶領

²¹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1997），頁 159。

²² 根據台經院所發布的「赴中國投資對台灣出口貿易之影響」研究報告中指出，亞洲國家中，台灣對中國出口依存度最高，達 22%，比起新加坡的 14%、南韓的 10% 和日本的 2% 高出非常多。

²³ 據陸委會的統計，至 2007 年年底，台灣地區申請赴往大陸的人數高達 445 萬人次，同時中國大陸地區申請來台的人數也到達 24 萬人次之多。

²⁴ 相關著作請見吳乃德，「省籍意識、至至支持與國家認同」，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編（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吳乃德，「自由主義與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5-39；蕭新煌，**台灣命運中國結**，（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蕭新煌、范綱華，「政治大轉型的族群集體心事」，發表於「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二）：差異、認同與階層化」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2001 年 1 月 12 日）；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社，1997）。

二百萬國軍、忠於國民黨的公教人員及他們的眷屬撤退到大陸邊緣小島—台灣後，台灣地區人們的政治群體認同，成爲恆久難解的內政、兩岸及外交的棘手問題，也是台灣生存的重大危機所在。對大多數國家的人來說，要說出「我是 X 國人」是沒什麼困難的，但是身在台灣地區的人們，卻在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之間牽扯不清。除了「中國人」與「台灣人」之分外，另有「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及「新台灣人」的新類別團體的名稱。²⁵「台灣」與「中國」之爲群體的標示，混雜了族群與國族的概念，也混雜了文化與政治的意涵。²⁶ 近幾年，在回答「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上，漸不再是以具體的血緣、地區來分類，而轉向抽象的族群定義。其中兩個主要的族群定義是「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與「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人民因爲自我族群定義的分歧，被劃分成此兩個新的族群，然而，造成人們選擇不同自我定義的因素，依然與族群有關：一個是原來的省籍意識、一個是政黨認同。²⁷

「認同」可以說是一個人選擇情感依附對象的過程，從父母、家庭、社群、民族、到國家，一個人的自我範疇乃延伸到特定的社會團體。易言之，社會認同是指以一種含括有其他人之社會類別定位自己的心理歷程，而以血緣、語言、文化及歷史等屬性分類的社會團體，慣稱之爲族群。²⁸ 一些研究顯示，族群認同與個人的統獨立場有關。²⁹ 由於當人們將自己劃歸於某一群體(族群認同)之後，也更會去認識與服膺該團體成員所共享的行動規範與團體目標。族群認同此時也就構成一種「社會表徵」(social representation)。一種團體形式的社會表徵，包含著身爲一團體之成員的意義，以及團體成員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應做出何種行動等內涵，因而會指引團體成員相關的行動方向。³⁰ 人們會對將之認定爲其有相

²⁵ 蕭新煌，*台灣命運中國結* (高雄：敦理出版社，1987)。

²⁶ 李美枝認爲就台灣這個範疇，就有「文化中國，政治台灣」、「文化中國，政治中國」、及「文化台灣，政治台灣」的三種不同認知。第一種認知，接受台灣與中國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事實，但台灣有它自己的政治實體。第二種認知，不但認爲台灣與中國有共同的文化，而且，雖然目前屬政治分化狀態，最終將合爲統一的中國政治實體。第三種認知則認爲，雖然台灣曾爲中國的一部分，但台灣有屬於它自己的四百年歷史，不要說政治上已成爲獨立的實體，文化也不同於中國了。請參考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20 期 (2003 年 12 月)，頁 41。

²⁷ 高恆信、李美枝。「台灣地區人民之省籍、黨籍與政治意識型態在政治群體認同中的糾結」，*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13 期 (2000 年)，頁 246。

²⁸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42。

²⁹ 陳文俊，「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爲—民國八十三年省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第 2 卷第 2 期 (1995 年)，頁 99-136。

³⁰ Uwe Flick,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al*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Jonathan Potter & Margaret M. Wetherell, "Social Representation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同血緣系統與文化系統的人，視為我團體的份子而產生親近相屬的認知與感覺。這種含有心理意向性的族群認同基礎，台灣人類學家王明珂名之為「血緣親親性」(lineage nepotism)與「文化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³¹ 若此，台灣民眾如何認定大陸民眾與自我在血緣系統與文化系統具有何種程度的相似性，就成為視對方為我團體或他團體的重要影響因素。³²

對於族群認同與族群隸屬(即源於父母親之血統)的各自效應，學者莊耀嘉以新一代的大學生為樣本，檢驗社會認同論可否解釋台灣大學生對大陸人之偏見，結果發現族群認同會形塑統獨立場，並且也會調節對中國大陸與大陸人之偏見。族群隸屬則無論對統獨立場，抑或對兩岸交流所持態度皆有顯著的直接效應。再且，此等效應的發生似乎不必經由主觀族群認同(或省籍意識)，也不必透過相對偏見。族群隸屬之「血濃於水」的直接效應，似乎是不容忽略的。各族群在台灣社會中所佔的比例，無疑是理解兩岸關係未來走向應考量的一項因素。研究中也發現，對大陸人的印象對統獨傾向雖無直接效應，但卻會影響對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及政治協商議題的態度。對大陸人的印象愈佳，愈贊成兩岸交流與互動，亦即降低對一群體的偏見，會有助於與該群體成員的互動。³³

2、隱性意識內涵

要研究台灣地區的政治群體認同，可引用歐洲社會心理學家等人社會表徵理論(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概念。³⁴ 其認為現實生活中的類別群體背後隱含有歷史性、文化性、意識型態性的意涵。個人對其所歸屬的類別團體有單純之類別團體的當下顯性認知，也存有隱涵的文化、歷史認知元素。也就是除了需探討個人此生此世之相關經驗外，也要追尋可能表徵在個人認知系統內，個人所依存的群體歷史與文化。如高恆信與李美枝發現台灣民眾中，清楚表達支持民進黨

Racism,” In Uwe Flick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al*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8-155.

³¹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社，1997）。

³²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43。

³³ 莊耀嘉，「族群與偏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社會認同理論的檢驗」，*本土心裡學研究*，第 20 期（2003 年 12 月），頁 73-104。

³⁴ Surge Moscovici,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R. M. Farr & Surge Moscovici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Moscovici,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History,” *Culture and Psychology*, Vol. 4(1998), pp. 411-429; Wolfgang Wagner et al., “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1999), pp.95- 126.

與國民黨者在表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上並沒有顯著差異。³⁵

歷史與文化如何傳承為個人的隱性意識內涵？可借用 Schutz 的理念概述之。³⁶ 任何社群都有一套既存的知識倉儲(stockofknowledge)³⁷。初誕生於這社會的新成員，對這些常識是無意識的。社會中的優勢份子，所謂社會化的代理人，會以各種方式傳輸這些倉儲知識，使之成為新成員的社會意識。初始階段它是一種學習的歷程，用的是控制的、顯性的認知歷程。個人重覆暴露於倉儲知識的結果，意識的內涵逐轉化為無意識的內涵，而成為習慣成自然，表露於言行而不自知的隱性認知。共有倉儲知識的擁有保證了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主體(inter-subjective)溝通的可能性。³⁸

在 1949 年政府遷至台灣由國民黨統治的約五十年間，藉著掌控教育與其他社會制約機制的力量，提供台灣與中國共有相同歷史與文化之認知表徵或意識倉儲的訊息，因此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共有血緣、歷史與文化的認知，應該穩定地存在於很多人的記憶系統中。而後，在李登輝前總統執政至民進黨執掌政權的期間，台灣本土意識逐漸強化，不論在教育或公開場合上其強調四百年的移民史、強調在台漢人四百年來的共同經驗已經成為獨立於中國大陸的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明顯的有別於蔣家父子執政時期所刻意培養出來的大中國意識。再加上歷經台灣經濟奇蹟、社會動員、民主洗禮、選舉淬煉的台灣人民，對於自由經濟與民主憲政生活方式及制度架構都已習以為常，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已出現了微妙的變化。³⁹

現階段的年輕學子正是處在過去大中國意識教育與新崛起的台灣意識銜接交界。Wilson, Lindsey 及 Schooler 整合過去有關態度改變的研究與理論，提出了雙元態度(dual attitude)的理論模式，認為人們可能由於過去生活經驗的影響，而將對某態度對象的評價感覺貯存於記憶系統中，但也有可能在新近的生活經驗中，建構了對同一對象的認知架構。然而新的認知並不會完全抹殺或取代舊有的

³⁵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43-45。

³⁶ 葉啓政，「從中國社會學既有性格論研究中國話的方向與問題」，收錄於楊國樞、文崇一所編之**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頁 115-152。

³⁷ 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³⁸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44。

³⁹ 吳玉山，「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中國事務**，第 4 期（2001 年 4 月），頁 71-89。

態度，是舊有的評價感覺以隱性的模式而存在。⁴⁰ 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與「中國」之間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共有相似與疏離相異，有兩種對立的認知結構，而這兩種認知結構應該共存於他們的記憶系統中。⁴¹

3、共土、共生之「生活場域親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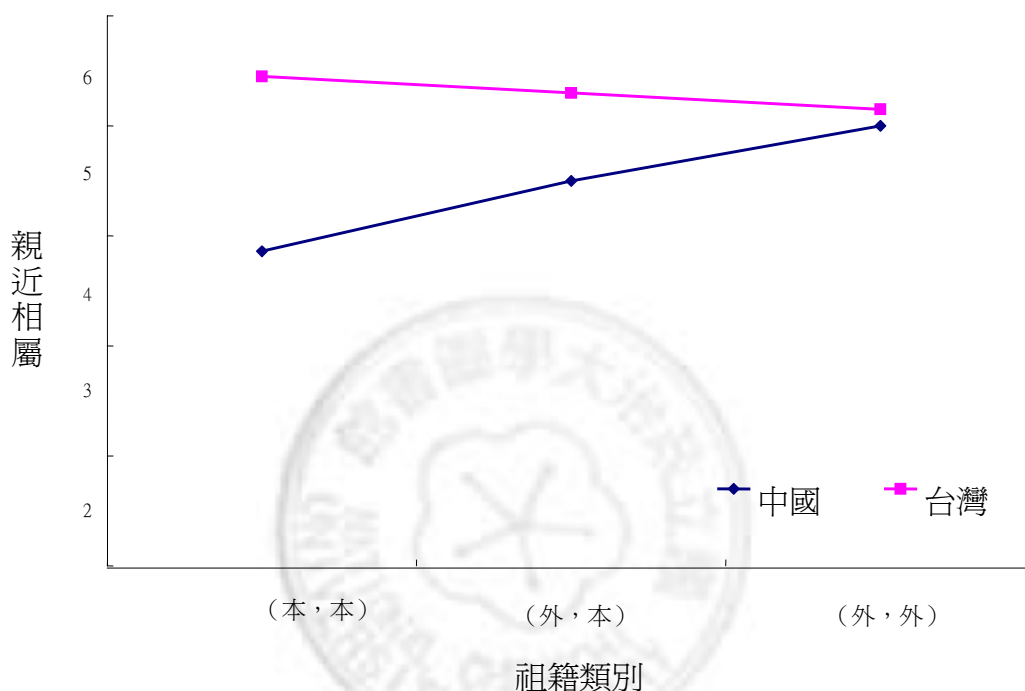


圖 1-1 祖籍類別對台灣與中國親近相屬程度的評分

資料來源：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56。

學者李美枝發現今日台灣民眾，不管移民年代的先後，其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在血緣親親上及歷史文化的共源上，客觀而論應沒有太大差別，就上圖來說，是根據父母的籍貫，將受試者分成三類，以親近相屬為依變相。結果不論個人的祖籍類別為何，對台灣都有同等高程度的親近相屬感。⁴² 六種身分定位的受試者對「中國」，在「同種同文」與「親近相屬」向度上有相似的

⁴⁰ D. Wilson, T. et al.,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view* No. 107(2000), pp. 101-126.

⁴¹ 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45。

⁴² 結果是同於蕭新煌與范綱華之調查，其發現雖然本省人主觀上認為外省人愛臺灣的程度會不如本省人，但是外省人愛臺灣的自評其實並不低，這兩者背後的心裡基礎應該也是生活場域親近性；他們所不同於本省人者可能是另有一份與中國較鮮明的牽連，使他們對中國持有較強的掛懷。詳請見李美枝，「台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頁 55-57。

差別評定型態，他們全體對「台灣」的親近相屬感卻都是高評分。這種不管身分定位如何，均愛好「台灣」的心理基礎，李美枝引申 Kurt Lewin 生活場域(life space)⁴³ 的概念，名之為「生活場域親親性」，它包括了文化親親性，但有多於文化親親性的成分，亦即俗話所說的，共同生於斯，長於斯而自然孕育之人親土親鄉親的熟悉感與情感。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青年學生參與統戰團是否會對其政治態度或政治認同發展轉變」既為此研究所欲探究之主題。因此，本論文之自變項為「交流接觸」。而此又視其操作的形式而有不同。包括有：1、**政治統戰**：意指直接使參與者有被統戰的感受。包括政治上的接觸、談話與招待。例如在2005年的「牽手未來、牽手希望—海峽兩岸四千大學生大聯歡」活動。活動間不但有黨政職的官員談話，並且於官方場所接待。2、**社文默化**：活動內容不是赤裸裸地以政治目的來呈現。中共官方或是接待單位會以其他名義包裝該活動，例如以文化饗宴或是專業科目學習來粉飾其背後真正的統戰意圖。另外，亦包括社會接觸，例如社會貧富狀況的觀察使成員瞭解中國大陸之動向。3、**管道建構**：人際互動、網絡的認識與累積，包括活動期間接待人員與台灣成員的互動瞭解，以及活動結束後雙方仍保持密切的聯絡。

在依變項方面，有較低層次「政治態度」與較高層次「政治認同」之分。統戰團之行程規劃通常在一個禮拜左右，中共可以藉由這短短幾天的活動力求活動內容包山包海，從政治性的直接接觸到間接性的遊覽河山、奧運會場參觀、訪視其傲人之經濟建設，企圖讓台灣師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論是經濟實力之提升或是民主價值層次已有轉變，抑或文化根源及歷史情懷之感同身受，皆是中共相關統戰單位努力之著眼點。這樣看來，期間內可以達到的效果可能有：政策反思，例如同學們認為應儘速開放三通、兩岸直航應降低國家安全層次的考量等；在情

⁴³ Kurt Lewin,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感上，則可能發現到中國大陸或是中國共產黨其實並不如原先所預期之不民主、髒亂、官員迂腐等負面印象。

就較高層次效果而言，其中之網絡建構(即人際網絡的建立與累積)則是可能導致政治認同發生改變的重要因素。由於網絡的聯繫，參與者即使回到了台灣也能繼續與對岸保持聯絡，在溝通管道持續暢通的情況下，彼此間的想法與意識也能持續地交流。長久來看，不能不重視其在政治認同層面有可能發酵之效應。並且，在身份認同或者說自我認定這方面，亦有可能造成改變。觀察中共在交流過程中，相當強調「文化與歷史的同屬性」，也就是企圖加深台灣方面在文化認同意識的強度，進而擴及政治認同之領域。⁴⁴ 文化認同的核心部分是民族認同，民族認同的強化同時也能帶來文化認同的擴大。並且，文化認同相對於政治認同具有持久性和穩固性。因此，訴諸文化認同能夠促進政治認同，乃至國家認同。

綜合上述，本研究便可針對研究的依變項進行解釋，即「參與青年交流(交流接觸)」如何對政治態度及政治認同造成影響？本研究的整體解釋架構，圖示如下。

⁴⁴ 政治認同是公民對某種政治權力的確認，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包括對組織或權力所規定的體制、政策和政治思想的認同。文化認同是個人對某種文化形態的確認，包括對價值規範、宗教信仰、語言、藝術、風俗、習慣的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密切而複雜。無論何種認同都不是絕對的，都具有社會性，它可能隨著社會的變化出現變化；任何認同也都不是單一性的，它可能隨著社會的複雜情況出現交叉重疊，呈現出多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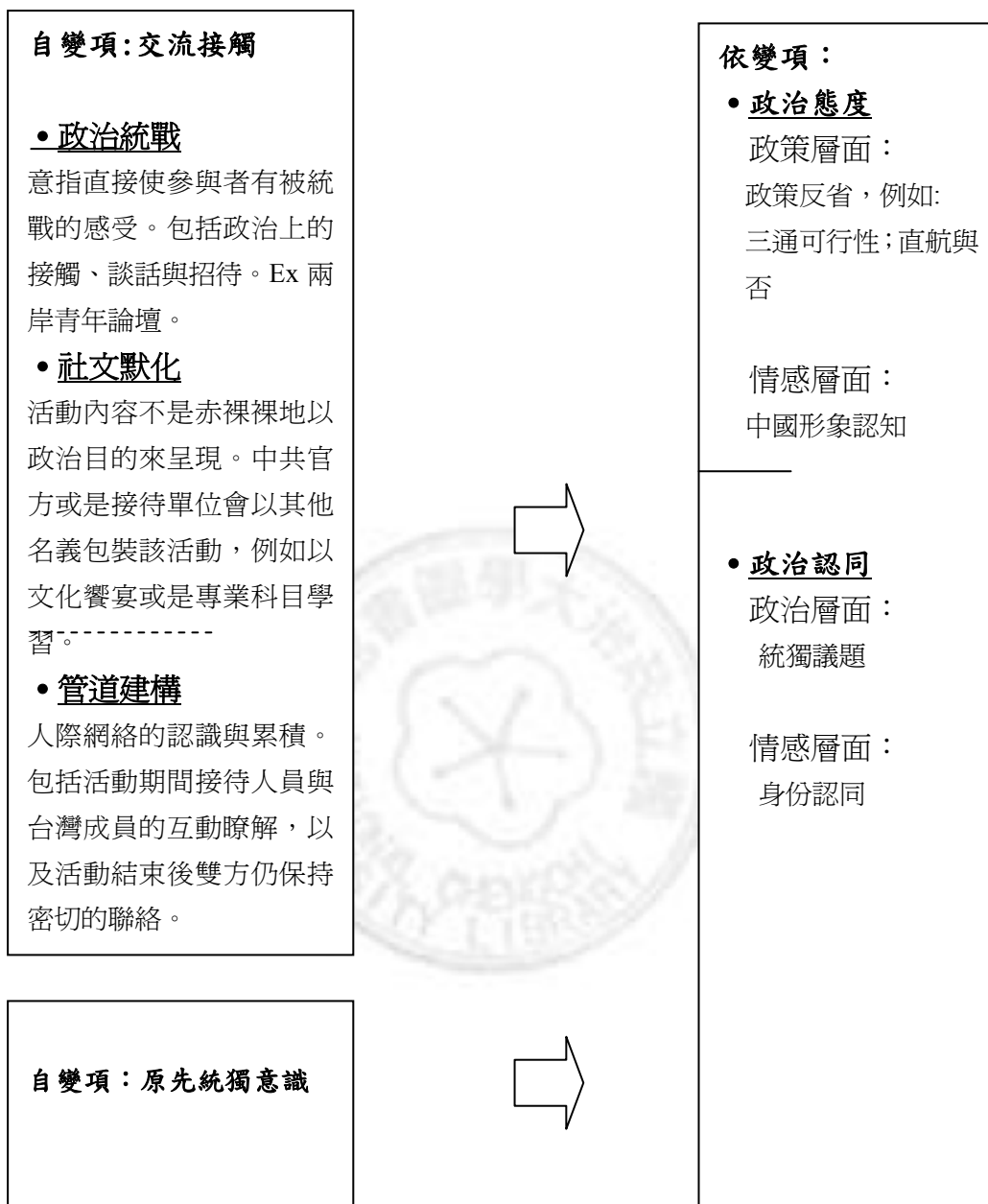


圖 1-2 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青年學生參與統戰團是否會對其政治態度或政治認同發展轉變」本為此研究所欲探究之主題，也是筆者最初的論文假設。但是在閱讀相關資料的過程以及過去的親身經驗，卻發現有些青年參與統戰團，其動機不在於特別想要瞭解中國大陸，也不一定是因為對中國大陸具一定程度的好感；此外，活動過程中也不會特別專注聆聽吸收或熱衷發展人際網絡，這些人雖然會全程跟著行程走完，但是其動機與目的都與本文主題無關。因此為使研究的結果更具精確性與廣泛性，本文不得不先就「參與活動」的程度加以分級，也因此必須先區分研究對象在活動參與的原因、動機及涉入程度作分級。接著再展開第二間斷的篩選：區分初次參與者與多次參與者(大致區分為：初次、1~2次、3次以上)，接著再就訪談題綱與受訪者進行深入的討論，以瞭解其參與「青年交流」對其政治態度或政治認同是否有發生影響或造成改變。至於如何測量成員在政治態度及政治認同上的強弱，筆者設計了一份訪談提綱，詳見附錄二。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依賴質性方法，輔以部份文獻資料、報導與統計資料，另外，筆者針對「有參與青年交流者」與「未曾參與青年交流者」各設計一專就兩岸相關重要議題之問卷，發與同學填答，並完成初步的量化統計。具體而言，筆者是以聚集青年交流人數最多的北京與上海二個城市之交流團團員進行訪問，方法主要為深度訪談，並視情形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至於訪談的對象，主要涵蓋三大群組，即一般學生、學生領袖、及曾參與交流活動規劃之學生幹部，共有 20 位訪談對象(具正式訪談有 14 位，詳見附錄一)。

(一)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本研究主要透過訪談的方式進行質性資料的收集，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研究法，由筆者依訪談問卷擬定之題目逐項提請受訪者回答，而為使答案可以與研究主題更具深入性，同時輔以「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 研究法，讓田野資料可以更加完善。其次採取觀察的方式，可以直接面對與聽到被訪問者的行為與反應，也可以對當時環境及場合擁有更具

體的意象。

第二階段為「田野工作階段」。就實際訪談之程序而言，首要者為化解受訪個案可能存有的疑慮與防備，使受訪個案了解筆者的研究內容及研究目的，解答受訪個案對研究本身的各項疑問，使受訪個案能暢所欲言，提供筆者所需要的所有研究資料。接著，筆者將請被訪談者描述參與「青年交流」的初衷、源由，在漫談時從其平時參與的活動大致瞭解其背景，是否有參與過具有明顯黨派色彩的活動，例如 2004 年牽手護台灣等，目的在於觀察被訪談者在參加該團前較偏向哪一屬性政黨色彩，藉以作為比較的觀察評估點之一。

在訪談進行中，筆者將不時地鼓勵受訪個案抒發其感觸。在深度訪談結束後，隨即進行第二階段的半結構式問卷訪談，由筆者依照問卷預先擬定的題目逐項提請受訪個案回答，問卷訪談進行中，筆者將時刻參照前一階段深度訪談所得的內容，如果發覺兩者之間有任何相關性，將提請受訪個案一併說明解釋；若在兩階段訪談中所獲得的答案之間，明顯有出入時，筆者即針對該議題深入詢問受訪者，以求徹底釐清受訪個案之確實意見。至於訪談過程中所獲得之訪談錄音及「田野筆記」(field-notes)，則帶回逐步釐清並進行資料分析。